

2014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与分析*

黄泰岩

内容提要:本文对2014年我国17本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14年中国经济研究前20大热点,并参照2003—2013年的热点排名,分析了2014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排名变化,揭示出2014年中国经济学研究是围绕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入“新常态”这一主基调展开的,并由此决定了2014年中国经济热点排名变化的动因及其表现出的十大特点,然后从前7大热点问题阐述了2014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进展,最后根据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当代使命探讨了中国经济学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和方式。

关键词:新常态 改革 创新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更大的一年。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学界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体现出了新的特色和进展。

一、2014年中国经济研究前20大热点

2014年学术期刊统计样本的选取采用了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最新公布的2014—2015年CSSCI来源期刊经济学类排名前20名杂志,然后依据二级学科平衡的需要,选择了作为2014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分析的13本统计样本期刊^①。由于其他杂志也刊有经济学的文章,为了保证覆盖面,我们又选择了其他4大类即马克思主义类、管理学类、社会科学总论类和高校综合性社会科学报类各自排名第一的期刊,组成了共17本统计样本期刊^②。由于CSSCI来源期刊排名每两年公布一次,因此2014年的17本样本期刊与2013年的样本期刊完全一样,从而保持了期刊统计样本的稳定性和可比性。

2014年我国专家学者在以上17本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不包括书评和会议报道等)共1816篇,较2013年进一步减少,说明当前主要学术期刊刊发长篇幅文章的特点进一步突出。我们对1816篇文章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14年

中国经济研究前20大热点问题(见表1)。按排名先后分别是:经济增长与发展、资本市场、三农、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自主创新、货币政策、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低碳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排在第11—20位的热点问题分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公共经济、财政体制、就业(含失业、创业)、消费、资源经济、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社会保障、企业融资、计量经济。

二、2014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变化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中国经济指明了方向。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一是双目标,即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产业从低端迈向中高端。二是双动力,即技术创新驱动和制度创新驱动,简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三是双协调,即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重点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重点推进“三大战略”。四是双适应,即经济发展要适应人口资源环境的约束;经济发展要适应民生的诉求。五是双结合,即宏观政策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微观放活与管好的结合。在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的认识起点上,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就必然成为2014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基

* 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081,电子邮箱:htaiyan@sina.com。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阶段性成果。

调,从而也就决定了 2014 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变化的新特点。在前 20 大热点中,经济增长与发展和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的是双目标;自主创新和经济体制改革体现的是双动力;三农和区域经济发展

体现的是双协调;低碳经济、资源经济、就业、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消费体现的是双适应;货币政策、财政体制、公共经济、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资本市场、企业融资体现的是双结合。具体表现在:

表 1 2014 年排名及与 2013 年排名相比的新变化

热点	2014 年排名	2013 年排名	变化
经济增长与发展	1	1	未变
资本市场	2	5	上升 3 位
三农	3	2	下降 1 位
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	4	3	下降 1 位
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	5	4	下降 1 位
自主创新	6	7	上升 1 位
货币政策	7	6	下降 1 位
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	8	8	未变
低碳经济	9	9	未变
区域经济发展	10	11	进入前 10 位
经济体制改革	11	18	上升 7 位
公共经济	12	10	退出前 10 位
财政体制	13	16	上升 3 位
消费	15	11	下降 4 位
社会保障	18	20	上升 2 位
计量经济	20	13	下降 7 位
就业	14	21	新进入前 20 位
资源经济	16	26	
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	17	30	
企业融资	19	23	
人民币汇率	23	14	退出前 20 位
企业成长	24	15	
公司治理	22	17	
民营经济与家族企业	39	19	

1. 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研究继续高居榜首。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变,最突出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何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能实现多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学者们在进入新常态的起点上做出科学的回答。因此,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继续研究高居榜首,就在情理之中。这具体体现在:(1)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至今仍然复苏乏力和不确定。我国虽然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应对,但经济下行的

压力不断加大,经济增长速度从 2007 年 14.2% 的高点一直下行到 2015 年一季度的 7%,出现了腰斩!从 2015 年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来看,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在加大,中国经济是否还会继续下行,引起了国内外人们的担忧,如美国学者沈大伟 2015 年 3 月 6 日预言: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崩溃,而且不会是“和平的崩溃”,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复杂的、暴力的”。这就需要学者们对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中高速增长做出科学的判断,对中国经济崩溃论做出有理有据的回应,这也是我国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需要。(2)中国经济增长将从过去 30 年

近10%的速度下调,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增长速度下调到什么位置,仍是学者们争论的重点,这也是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必须要界定清楚的问题。从日本、韩国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他们在实现了近30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之后,都进入到了近20年4%~6%的中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在书写了35年近10%高速增长的光辉之后,是否会重复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当年的故事,就成为学者们当下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既然日本、韩国等经济体高速增长后实现的4%~6%的经济增长被界定为中速增长,那么,我国提出的中高速增长就至少应该保持在6%以上。^③同时,还应看到,我国毕竟是不同于日本、韩国的人口大国,这就需要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找到我国经济增长不能滑出的底线。按照稳增长就是为了保就业的逻辑,我国要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下限就一定会是高于6%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将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确定为7%左右的原因。(3)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调控也随之走向科学的宏观调控。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宏观调控从以往“保8”的点调控转向了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的“区间调控”,这就需要确定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合理区间。(4)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既然是“常态”,就不应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概念,那么这就需要学者们回答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需要研究中高速增长的空间、新的增长点、新的增长动力,以及支撑中高速增长的资源、环境等条件。

2. 经济体制改革大幅上升,距进入前10大热点问题仅一步之遥。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从2013年的18位上升到2014年的11位,跃升7位。从2003年以来的历次排位高低来看,只有2008年由于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排到第9位的历史最高位,2014年的排位仅以两位之差屈居第二。2014年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再回新高的根本原因在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就使2014年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就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为经济新常态提供新动力、新活力。具体体现在:(1)新一轮改革需要新的改革理论指导。新一轮改革与以往历次改革最大

的不同在于,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and 攻坚期,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新理论,拿出新举措;另一方面这一轮改革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全面的改革,这就突破了原有在经济框架中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传统思维,上升到从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探寻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规律。(2)新一轮改革是实现中高速增长新目标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三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当我们把这三个经济周期与前三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酝酿和出台联系起来考察时就会发现,每一轮改革的启动都是发生在经济进入调整和谷底阶段。经济周期孕育了改革周期,改革周期促成了经济周期,二者互为因果。2014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新一轮“改革红利”就开始显现。据统计,2014年,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达到1293万户,其中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45.9%,形成新的创业热潮。^④从历史经验来看,1992年和2002年私营企业开户数都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出台前后出现一个高峰期,随后是5年的经济繁荣。自2008年进入经济调整以来已经经历了6个年头,迫切需要改革这个“点火器”。(3)新一轮改革需要新动力。新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清理审批事项,构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切实为市场主体松绑。为此,就需要政府制定权利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因此,新一轮改革的突出特色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是,以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型或政府推动型的,如今让政府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从而自己革自己的命是相当困难的,这需要具有巨大的改革勇气和敢于做出巨大的权力和利益牺牲。显然,这就需要寻求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但这个新动力必须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因为单纯依靠外在的力量是不可能推动改革成功的。

3.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再次进入前10。2009年以来,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都是在第10位和第11位之间徘徊,2014年再次回到第10位,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实现中高速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增长点,如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差距

来看,中西部的发展潜力巨大。^⑤中部和东北相当于东部的 3/4,西部不到东部的 2/3;从全面小康指标的的实现程度来看,西部仅相当于东部的 80%,大约晚 7 年左右。^⑥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即使达到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水平,也将支撑我国 10 年左右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在继续实施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板块”基础上,重点推进“三大战略”,具体体现在:(1)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三大经济圈中的城市群总人口约占全国的 18%,GDP 占全国总量的 36%,为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⑦但是三大经济圈的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与美国和日本三大经济圈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二者人口和 GDP 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33%、68%和 50.2%、70%^⑧。这意味着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新体制下,我国的人口和产业会继续向三大经济圈中的城市群集聚。在三大经济圈中,京津冀经济圈的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相对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圈而言显然是滞后的,珠三角的国土面积只有 5.48 万平方公里,但却集聚了 5700 万人,4.8 万亿元的 GDP;长三角的国土面积为 11 万平方公里,集聚了 1 亿人,9 万亿元的 GDP;京津冀的国土面积也达到 18.27 万平方公里,但却只有 8700 万人,5.2 万亿元的 GDP。^⑨如果从首都经济圈的视角来看,京津冀的发展空间更加巨大,如东京经济圈的国土面积小于北京市,但集聚的人口却达到 4300 多万,多于北京的 2100 多万;GDP 占全日本的 37.5,而北京市占全国的比重达不到日本的零头^⑩。因此,探寻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模式和道路,就成为当前学界的一个迫切任务。(2)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和产业虽然主要向三大经济圈集聚,但我国却是一个地域和人口大国,虽然需要继续发展三大经济圈,但是否需要谋划第四经济圈,甚至第五经济圈,以支撑我国经济未来 10~20 年的快速健康发展,实现中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工业化、现代化,这就需要做出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出,就是探索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构建中三角经济圈或第四增长极的积极行动,具有突破发达国家区域发展模式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值得学界做出深入的研究。而且,中三角经济圈的实验取得成功,就可以向

西三角经济圈、东北三角经济圈复制,形成沿海三大经济圈、中西部三个次级经济圈的区域发展格局。(3)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谋划出了我国新常态下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我国过去 30 多年的对外开放,从区域来看,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从开放国家来看,主要是对发达国家的开放;从资金流来看,主要是单向地流入我国。在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一方面可以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动力;另一方面可以使中国经济摆脱对发达国家资源和市场的过度依赖,开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市场和新资源。“一带一路”建设虽然可以借鉴过去 30 年沿海开放的经验,但是,这毕竟是不同于沿海开放的沿边开放,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是资金的双向流动,而且更多的是“走出去”,因而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这就需要学者们站在商品、资本、劳动等要素双向大流动的新视域中揭示“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模式和新道路。

4. 自主创新的地位日益突出。自我国 2006 年提出构建创新型国家以来,自主创新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且近几年来对其关注度保持第 6 位和第 7 位,2014 年比 2013 年上升 1 位,达到历史最高。自主创新地位凸显的原因在于:自主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强大动力和唯一途径。具体体现在:(1)自主创新是决定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从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来看,是否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造成不同国家不同发展结果的根本原因。据诺贝尔奖得主麦克·斯宾塞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 13 个经济体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了 7% 以上的经济增长达 25 年之久。^⑪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相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技术进步则非常缓慢,从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重来看,从 1996—2009 年的 10 多年间,阿根廷徘徊在 0.4%~0.6% 之间,墨西哥徘徊在 0.3%~0.4% 之间,马来西亚徘徊在 0.2%~0.7% 之间,没有发生质的飞跃^⑫。(2)自主创新是实现中高速增长目标的关键。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增长受到人口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而突破约束的唯一途径就是推进技术创新。例

如,美国通过技术进步使人工成本相对下降,实施再工业化带来了产业的回流;又如,2009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2.9倍、日本的4.9倍、欧盟的4.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⑤,这意味着我国通过技术进步完全可以做到在能源消耗不增加的情况下实现GDP总量的倍增;再如,在近五年中,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增长了近7%,而碳排放却减少了4%^⑥,这意味着我国通过技术进步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减少的并行不悖。(3)自主创新是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关键。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需要完成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服务业和打造新兴战略产业三大任务,而这都离不开技术创新。例如,据韩国《2012年度技术水平评价》显示,2012年韩中之间的国家战略技术水平差距为1.9年,而韩国与美国相比,则落后4.7年,二者相加,我国落后美国6.6年。^⑦这种技术上的差距,体现在产业上差距就相当显著,如从参与iPhone生产各国的利润分成可以看出,技术的落后决定了我国处在产业分工的低端,在全部的利润中,美国占49.4%,日本占34%,韩国占13%,而我国则不足4%^⑧。虽然自主创新对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如此重要,但在新常态下,自主创新却遇到了必须寻求突破的新瓶颈。这就是:经过30多年的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我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如韩国《2012年度技术水平评价》显示,韩中之间的国家战略技术水平差距从2010年的2.5年缩短到2012年的1.9年。^⑨这造成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开始阻止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另一方面中国技术进步所缺乏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已不可能靠学习和引进。这就迫使我国的技术进步必须从学习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因而需要学者们给出技术进步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5. 资本市场研究热度再度高企。资本市场自2003年以来一直排在热点的第1位或第2位,仅在2013年意外跌到第5位,2014年重返第2位。资本市场的再度雄起,从根本上说得益于新一轮改革的“制度红利”,具体体现在:(1)2013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较大篇幅对资本市场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和路线图,引起了学者们对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等改革措施

如何落地进行深入研究。(2)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从历史经验来看,2004年1月老“国九条”的出台,就为当时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带来了巨大的政策红利,A股由此进入了牛市通道。此次新“国九条”的面世,是否会奠定股市未来牛市的制度基础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3)沪港通的开闸推进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为我国资本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有助于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的发展。这是因为,我国股票市场与作为国际上比较成熟市场的香港股票市场的对接,必将会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规则、理念、文化、监管等方面的深化改革,走向国际化、标准化、合理化的发展轨道。我国股票市场从2014年第三季度开始由熊转牛,而且牛市持续至今,应该就是这一轮改革的“制度红利”。如果将其置于改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互动关系框架中加以理解,这是否意味着新一轮改革启动的新一轮发展周期即将到来。对此,我们将1990年以来上证指数收盘价平均值与同期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发现(见图1),在2005年实行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收盘价平均值与同期经济增长率不相关;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收盘价平均值与同期经济增长率变动表现出高度的一致。由此推论,我国资本市场表现出的改革红利应该扩展到经济增长的改革红利,股票市场的牛市应该是新一轮快速经济增长的先导,至少可以证明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6. 就业问题研究大幅上升再次进入前20。就业问题从2013年的第21位大幅上升到2014年的第14位,已经接近2007年第12位的历史最高。就业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是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密切相关。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就业的压力会日益加大。具体体现在:第一,随着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就会随之减少,就业的压力就会增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可以降速,但决不能失速。因此,经济增长率合理区间的下限,就要由失业率的上限来决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巨大,而就业又是最大的民生,为了确保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就需要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二,随着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一方面会对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力形成需求,排出低技能的劳动力,造成结构性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会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直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总失业人口的增加。这意味着经济转型越快,对就业的压力就越大。第三,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一方面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向海外转移或选择关闭,造成劳动就业岗位的减少;另一方面人工成本一旦超越临界值,企业会选择用机器替代劳动,近几年我国机

器人产业年均增长 20% 以上就是明显的证明^⑩。第四,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硬化,一些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会被强制关停,造成就业岗位的减少。如何缓解经济转型对就业的巨大压力,学者们从两方面给出了建议:一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就可以创造 100 万个新就业岗位^⑪,远远高于制造业创造的就业岗位;二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创新带动创业,用创业扩大就业。这两个渠道本身又可以推动经济转型,从而形成经济转型与增加就业的良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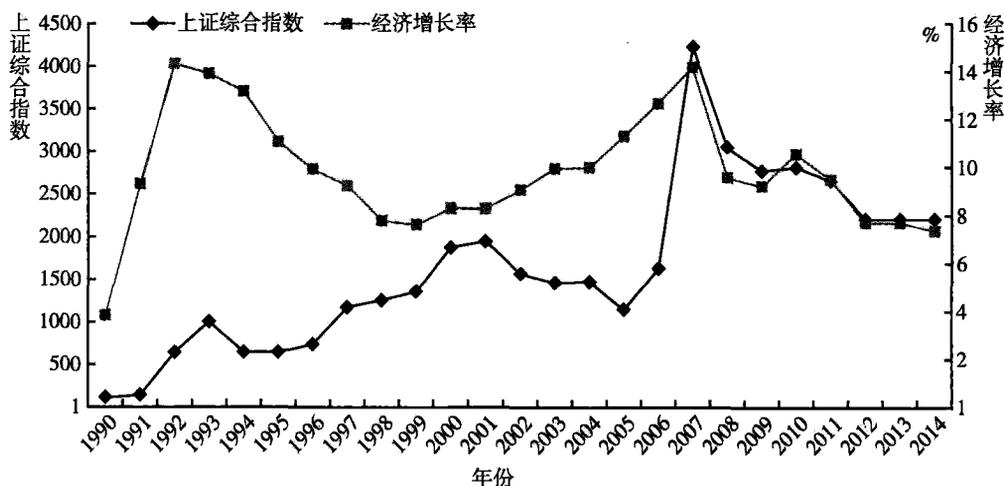


图 1 上证综合指数变动与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关系

注:年度上证指数为每日上证指数平均值,经济增长率为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7. 资源经济成为年度上升幅度最大的热点问题。资源经济从 2013 年的第 26 位跃升到 2014 年的 16 位,以上升 10 位的幅度夺得年度上升最快冠军。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4 月会见欧盟主席时明确讲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至少还有 10~20 年的快速发展机遇期。从工业化、城市化、区域发展等视角来看,我国完全有空间再实现 10~20 年的快速发展,但是,我国的资源条件还能支撑 10~20 年的中高速增长吗?这是学者们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具体体现在:第一,支撑中高速增长的能源存在缺口。2013 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耗折合 37.5 亿吨标准煤,消耗了世界 22% 的能源^⑫。根据 BP 最近发布的《2035 世界能源展望预测》显示,我国能源生产的总产量到 2035 年将增加 47%,消费量增加 60%;我国在全球能源需求中的比重将从目前的 22% 升至 2035 年的 26%,存在巨大的能源缺口,因而我国到 2035 年将超过欧洲,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进口依存度从 15% 升至 23%。^⑬第二,支撑中高速增长的矿产资源存在缺口。2012 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为 11.6%,但却消耗了全世界 54% 的水泥、45% 的钢。^⑭我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将超过 80%。^⑮第三,支撑中高速增长的水资源存在缺口。根据麦肯锡研究报告预测:我国 2030 年水资源需求量将达到 8180 亿立方米,与国家规划确定的供给量相比存在较大的缺口,而且工业化和水污染会使中国 21% 的地表水资源无法运用于农业和生活,因而考虑水源质量,供需缺口更为严重。^⑯第四,我国的粮食安全也面临巨大压力。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但粮食自给率却出现连年下降,2014 年粮食自给率已降至 87%。我国不能因为资源的约束,放弃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因而如何确保实现中高速增长的资源支撑,迫切需要学者们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8. 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排位创历史最高。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问题在2005年排在第41位,之后位次不断升高,2011年达到第18位,2014年进一步上升到17位。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问题关注度的提高,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第一,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行,以及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造成不良贷款累积和金融风险增加。第二,随着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房地产的直接贷款,以及以地产做抵押而获得的贷款出现巨大的金融安全问题,据测算这方面的贷款占到银行贷款的40%以上。^⑤第三,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行,影子银行带来的金融风险凸显。根据奥纬咨询公司的数据: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在31万亿人民币,不良贷款率估算在10%(基准情景)至23.9%(灾难情景)。其中约有22%至44%的影子银行不良贷款会转移至商业银行体系,进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最多提高1.8%(基准情景)至4.3%(灾难情景)。另据银监会的数据,2014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1.64%;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29%。影子银行将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提升至3.09%~5.59%^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至今还没有摆脱,我国金融安全存在的隐患就必然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9. 企业融资再度引起关注。企业融资2009年开始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但排名一直比较靠后。2012年的排名从2011年的第58位直接跃升至第20位,2013年又下降至23位,2014年回升到第19位,创历史排位最高。上海新沪商联合会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2014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指数》显示:融资难、人工成本上升和行业内无序竞争是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三大困境,其中51%的受访者认为融资难是民营企业成长的最大困境。该报告还显示,对于经济危机下的政策扶持,仅30.7%的民营企业企业家认可利好作用,因而有超过六成的受访企业家认为,“政府应该对企业发展困境负主要责任”^⑦。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在经过30多年近10%的高速增长后,进入了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转型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发展新阶段,从而对企业融资带来了更加不利的宏观环境,特别是为了化解前期我国为应对2008年

世界金融危机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步累积和显露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就不得不采取去杠杆、去泡沫的宏观调控措施,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仍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也是企业普遍感到目前比2008年还困难的原因所在。如何在稳健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寻求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通道,考验着中国经济学人的智慧。

10. 财政体制又重回高位。财政体制问题自2006年以来一直保持在前20位,2012年达到第12位的历史最高,2014年从2013年的第16位重回第13位的高位。财政体制再度引起关注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财政体制,具体体现在:(1)新一轮改革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2014年国务院共召开了40次常务会议,其中有21次部署了“简政放权”。这就要求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2014年我国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比例达到70%以上,就是要将民生底线兜住兜牢。(2)随着简政放权,就需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问题。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债务负担沉重,还债能力弱,隐藏着巨大的地方债务风险。根据审计署公布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地方债务规模超过20万亿元。而根据2013年数据计算,地方政府收入对土地和房地产的依赖度超过了56%,(见图2)全国有23个省份最少的也有1/5债务靠卖地偿还^⑧。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债能力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简单地将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地方政府将难以承担起应担当的职责,甚至可能导致企业办事比以前更难、成本更高。(3)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企业和消费者的税负过高,不利于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宏观环境。据估算,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达40%左右,而OECD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约为24%~27%,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宏观税负相对较低,大约在20%左右^⑨。在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财政支出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如何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迫切需要学者们拿出破解的创新性思路与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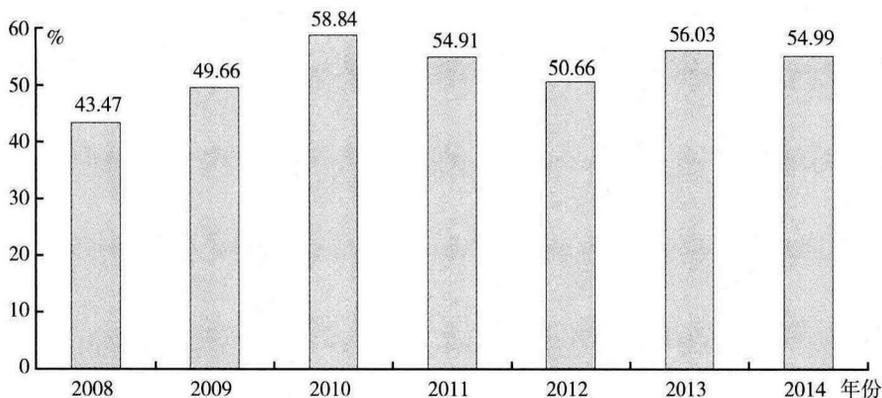


图2 全国房地产相关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财政部公布的税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数据计算。

三、2014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主要理论进展

相对于2013年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进展,2014年学者们对前10大经济热点的理论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又取得了新进展:

1. 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研究进展。与经济新常态相对应,学界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的进展突出表现在:(1)从潜在增长率角度深入探讨经济减速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对经济进入新常态做出解释。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潜在增长率下降引起了当前经济减速,并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具体有:第一,认为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发生根本性变化,人口红利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第二,认为资本存量增速下降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三,认为除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外,“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消退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等也造成了潜在增长率下降。(2)强调未来政策取向应以供给管理为主,为新常态的宏观调控定调。与潜在增长率带来经济减速相适应,学者们普遍认为,继续从需求侧调控经济将会使得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加剧产能过剩,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应转向供给管理为主,创造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条件。具体包括:第一,强调深化改革,以改革红利促进潜在增长率提高;第二,强调推进第三次动力系统转型,主要依靠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第三,强调通过生育政策、延迟退休、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人力资本水平等人口政策调整,提高未来潜在增长率;第四,强调提高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第五,强调了提高资源配置和资本积

累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第六,强调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质量。(3)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估体系并评估经济增长质量,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理论支持。学者们突破了之前运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等表示经济发展质量的分析框架,开始探索能够全面评估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以准确判断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有:第一,将微观层面纳入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框架,拓展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第二,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出发,构建了多样化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估体系。一方面学者们继续从宏观角度完善经济增长质量评估体系,如从经济增长效率、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成果的可分享性和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四个方面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另一方面将微观层面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如将产品标准能力、投入要素质量、经济活动过程质量等纳入评价体系。第三,对当前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估,但得到的结果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测算结果发现,西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要远高于东中部地区。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自2000年以来有了很大提升,2012年经济增长质量相对于2000年增长了118%。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增长质量的各主要指标,如投资效率、劳动生产率增长、TFP增长、技术进步、能源效率、消费增长等,都非常优秀,超过了其他国家各个时期的水平,认为中国经济是“高投资、高效率、高技术进步”和“低能耗”的高质量增长,其结果是GDP和消费同步高速增长,从而反驳了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是粗放型增长的流行认识。

2. 资本市场的主要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

(1)随着2014年重启IPO,学者们重点深化了IPO效率研究。具体有:第一,将询价机构报价中意见分歧、董事会经历等纳入IPO定价研究框架,认为媒体报道、重大风险提示、券商背景风险投资等均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IPO溢价,提高IPO定价效率;第二,从投资者保护、双重保荐制度、国有企业改制等角度,构建了IPO资源配置效率分析框架,为进一步完善新股发行制度、稳定资本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投资者保护通过有效降低寻租,高声誉保荐机构通过提高企业过会概率,有效提高了IPO的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对政策性负担处置不彻底企业给予更高融资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则有损IPO资源配置效率。(2)完善了股价波动分析框架。第一,将融资融券纳入研究框架,对降低标的证券股价特质性波动和矫正高估股价,提高市场定价效率给予了肯定,然而由于融资融券制度实施时间较短,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第二,从宏观经济、投资者、股权分置改革和收入不平等的新视角,探讨了股价波动性的影响机制,丰富了股价决定理论,为稳定股票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宏观经济基本面、机构投资者、股权分置改革和透明度都有助于降低股市波动;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将导致股市波动加剧。(3)从行为金融学视角研究投资者行为。第一,从投资者理性程度、信息获取能力等层面考察了投资者行为,在肯定投资者具有信息获取和风险识别能力的同时,也关注了投资者的股市赌博动机、投资者非持续性过度自信等非理性行为;第二,将投资者情绪、异质信念、股利偏好等投资者行为纳入资本市场研究框架,考察了其对国家产业政策、投资者权益和基金溢价等的影响,为监管层引导投资者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

3. 三农问题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1)拓展和深化城市化质量研究。一是,将财政体制因素纳入城市化质量分析框架,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对空间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推动力度差异,以及省级承包式分税制造成地方利益分割的刚性,深入探究造成城市化失衡和扭曲的原因;二是,从地区资源配置、户籍身份福利和政府调控失效等新角度,重点探讨了城市化发展中的城市规模格局,基本得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城市群、以发展中型城市为主体,以及缩小不同规模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的未来城市化发展路径。(2)扩展农民工研究。第一,将多维贫困、农民工生命价值、农民工疲惫感、医疗保险、父母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等新因素纳入农民工城市融入度评估,提出了通过完善工会制度、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以及改善预防性保障等提高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为加快农民市民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将人力资本概念纳入农民工劳动供给分析框架,从农民工数量供给扩展到质量供给,提出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提高农民工供给质量。(3)突破了就农村土地制度谈农村土地制度的分析框架,从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等新角度探讨农地财产属性,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纳入农村金融范畴探讨农地的资产化和金融化。

4. 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研究进展。(1)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农村收入不平等增加了收入差距研究的层次性。第一,从适应性角度和区域角度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变动趋势,发现当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超出了合理界限,省际农村居民呈现双峰锁定式俱乐部趋同;第二,从人力资本、人口老龄化、农村金融抑制等角度探讨了农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人口老龄化、县域农村金融抑制都加剧了农民收入不平等,这为加快农村教育发展和农村经济转型,缩小农民收入不平等提供了理论依据。(2)深化了收入流动性研究。第一,将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从静态推向动态,测算了我国居民收入流动性中结构性因素的调整周期约为12.25年左右^⑨;第二,从家庭经济状况、职业和工作经验差别等角度深入考察了收入的代际流动,强调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代际流动性的重要性,提出了通过增加公共教育支出、保障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均等、破除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提高收入流动性,为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新视角。(3)进一步丰富了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突破了影响收入差距的经济因素,从气候变化、户口、社会资本、商业制度环境等制度和社会因素角度探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提出了面对未来气候变化等外生风险时扶贫政策应分类区别对待,消除职业准入障碍,以及改善企业商业环境等矫正收入分配扭曲,为缩小收入差距政策提供了新视角、新选择。

5. 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研究进展。(1)进一步

深化产业集聚研究。第一,测度我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但是结果存在分歧。相当一部分观点都认可我国制造业集聚度虽然不高但不断加深,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制造业集聚度仅在1998—2001年短暂上升,2004年以后明显下降。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出口类企业出现了过度集聚。第二,从避税、企业创新、学习能力等角度考察了产业集聚效应,认为产业集聚能够为企业减轻税负的避税港、企业创新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受益于不同类型集聚,以及在集聚中提高学习能力等,为促进产业集聚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从集聚经济、空间外部性、资本密集度、规模经济等角度探讨了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发现集聚经济、空间外部性和资本密集度与产业集聚正相关,然而规模经济对制造业集聚影响并不显著,为推动产业集聚提供了理论依据。(2)深化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第一,从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角度评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效率,均得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水平低下,产业低端化发展的趋势,挑战了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的传统认识。第二,从政府规制、地方政府行为等角度对政府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补贴绩效进行了考察,结果存在明显差异。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绩效和创新外溢效应是显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补贴并没有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研投入,是无效的,而且造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依赖。

6. 自主创新的研究进展。(1)从工业行业层面研究了自主创新。第一,通过与OECD主要国家对照和技术创新效率测度,评估了我国工业行业技术水平,发现除1993—1998年外与OECD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几乎停滞不变,2008—2009年间技术差距在缩小但速度放慢,到2009年58.8%工业行业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技术前沿^①,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效率在0.5~0.6之间^②,扩展了以全要素生产率评估技术水平的分析框架。第二,从环境管制、信息化、市场化和房价上涨等角度探讨了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并推演出合理的环境管制、信息化建设、非市场化导向和稳定房价有助于提高技术水平和效率,为提高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2)深化了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制度约束、要素市场扭曲、信贷约束、企业产权结构和经济转型等角度研究了FDI技术溢出

的影响机制,得出了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扭曲要素市场换取FDI的激励政策、信贷约束、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低的经济转型都影响了国内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为提高FDI技术溢出提供了理论依据。

7. 区域经济的研究进展。2014年区域研究的最大亮点是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1)谋划“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第一,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和国内西部大开发等角度,指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价值,即建构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亚欧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机制、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局面,以及推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第二,通过打造亚欧利益共同体、构建起全方位的交流互动平台、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搭建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等途径和措施加快“一带一路”建设。(2)提出长江经济带建设思路。第一,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指出长江经济带建设,将有助于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稳增长、调结构的最佳结合点,是实现中高速增长新的战略支撑。第二,提出了建立高效务实的区域协调分工机制、形成立体的综合的高效密集的交通网、构建合理的分工和紧密的产业联系、形成“东西互补、海陆联动、双向开放、双边出海”的区域产业发展新格局等举措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建设。(3)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出谋划策。第一,在我国三大经济圈建设中,就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京津冀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势在必行。因为京津冀是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区,是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承载地,以及应是世界级城市群。第二,提出应当处理好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共生互动关系、北京与天津两大核心城市分工合作关系,以及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突破地域发展瓶颈等措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四、中国经济学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进一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更是全体中国经济学人的责任担当,也将是中国经济学人对世界经

济学理论大厦的思想贡献。

要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首先要有中国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离开世界经济文明发展的大道。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源于古典经济学,但又不同于古典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的文明成果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之一,但中国经济学又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既要遵循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更要接地气,拥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彰显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是超越了现有经济理论框架的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要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不仅仅要有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中国经济学还必须要有用,能够解决中国问题,既要能够解释中国,而且更重要的还要能够改造中国,成为改造中国、发展中国、强大中国的有力理论依据。

依据对增强中国经济学理论自信的以上界定,我们就可以对目前所处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时代特征做出如下判断:

1. 中国经济学研究进入全面自主创新时代。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以及经济发展创造的“中国奇迹”,使中国经济学具有了运用自己的经验检验已有理论、创造新理论的现实基础。中国经济学进入了全面自主创新的新时代。这具体表现在:第一,用中国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理论,对那些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应当继承和发展;而对时过境迁已不符合现实的个别结论要敢于舍弃。第二,根据中国的实际对西方经济学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分析和改造,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经济学形成的背景和条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就使许多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有的至多能做部分解释。因此,不对经济学做出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改造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有害的。第三,提升新的理论概念、范畴,并解释出这些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30多年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必然孕育着新的理论与规律,揭示这些理论和规律正是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机遇和责任。可以预见,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经验基础上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探讨,必将迎来经济学理论

范畴和体系的新革命,展示出中国经济学人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

2. 中国经济学进入理论体系创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学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如概括总结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等奠基性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既是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伟大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又指导了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实践,得到了我国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理应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已经开始进入从个别理论、概念、范畴升华为理论体系的创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科学研究就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任务。

3. 中国经济学进入向“第一生产力”转化的新时代。我国已进入全面提升国家实力的新发展阶段。国家实力既包括硬实力,如经济总量、科技水平等,也包括软实力,如思想、文化力等。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硬实力有了很大提高,而软实力却相对不足。这就使社会科学的地位不断提高,并与自然科学一样成为“第一生产力”。但社会科学要成为生产力,也有一个成果向实践转化的重要任务。

因此,在已经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就需要推进如下转型:

(1)从单兵突进转向联合攻关。经济学从个别理论创新向理论体系自主创新的代任务转变,就要求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要告别“个人英雄主义”时代,进入到团队联合攻关的新时代。组建团队通常有两种形式:第一,正式组织,如在高校、研究机构内部或联合打造科研平台,组建创新团队等;第二,非正式组织,通常以课题为纽带将具有互补优势的相关人员组织起来,课题结束后团队自然解散。这两种形式各有优势,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做

出选择。

(2)从自我资源转向社会资源。要完成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自主创新,显然仅仅依靠个人的资源是力不从心的,这就需要整合社会资源以达到预期的目标。今天的经济学研究,已经不在乎你自己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你能利用多少资源。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就需要大智慧。调动社会资源,既包括研究所需要的物质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

(3)从单纯研究转向综合开发。社会科学的实践要服务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发展,从而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动力,与自然科学一样成为第一生产力。这就需要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思维,即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不仅要获奖,得到理论认可,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而且还要能够运用于实践,转化为生产力,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

注:

- ①在排名前20的期刊中,依据二级学科平衡需要,保留相同学科的排名靠前的杂志,从而得出经济类的13本样本期刊。
- ②在17本样本期刊中,经济类分别为:《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经济科学》《财经研究》《财贸经济》《南开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其他类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马克思主义研究》。
- ③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工业化时期均实现了30年左右9%~10%以上的高速增长,随后转入4%~6%的增长阶段,被认为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 ④资料来源:《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 ⑤李建平、李闽榕、高燕京:《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2012)》,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 ⑥国家统计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
- ⑦资料来源:《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 ⑧牛文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2—2003)》,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 ⑨《三大城市群(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对比》,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网站,http://www.gdupi.com。
- ⑩刘瑞、伍琴:《首都经济圈八大经济形态的比较与启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年第1期。

- ⑪林毅夫:《中国的增长奇迹是否可持续?》,《参考消息》,2014年12月12日。
- ⑫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 ⑬霍建国:《近看中国外贸》,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
- ⑭《英媒称2014年碳排放停止上升:中国减排功不可没》,参考消息网,http://science.cankaoxiaoxi.com。
- ⑮⑯未来创造科学部与韩国科学技术评价院(KISTEP):《2012年度技术水平评价》,韩联网,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
- ⑰《商务部官员:iphone利润分成中国占比不足4%》,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
- ⑱《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与机遇分析》,中国机器人网,http://www.robot-china.com。
- ⑲《迟福林:服务业将成主导 健康市场前景好》,中国改革论坛,http://www.chinareform.org.cn。
- ⑳《〈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4〉在京发布》,中国储能网,http://www.escn.com.cn。
- ㉑《BP2035世界能源展望——中国专题》,英国石油公司网站,http://www.bp.com。
- ㉒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节能减排工作情况的报告》。
- ㉓《中钢协:内地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将逾80%》,证券时报网,http://stock.stcn.com。
- ㉔张培丽:《我国水资源能够支撑中高速增长吗》,《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期。
- ㉕《惠誉:抵押增多令房地产风险成中资银行最大弱点》,华尔街见闻,http://wallstreetcn.com。
- ㉖胡群:《影子银行或致银行不良率上升至5.59%》,经济观察网,http://www.eeo.com.cn。
- ㉗上海新沪商联合会、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4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指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 ㉘《各省份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浙江最高》,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http://politics.people.com.cn。
- ㉙《财政部报告:企业综合税负达40%》,每经网,http://www.nbd.com.cn。
- ㉚牛晓健、裘翔、王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一个新的方法与视角》,《金融研究》,2014年第4期。
- ㉛陆剑、柳剑平、程时雄:《中国与OECD主要国家工业行业技术差距的动态测度》,《世界经济》,2014年第9期。
- ㉜肖文、林高榜:《政府支持、研发管理与技术创新效率——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白丽健)